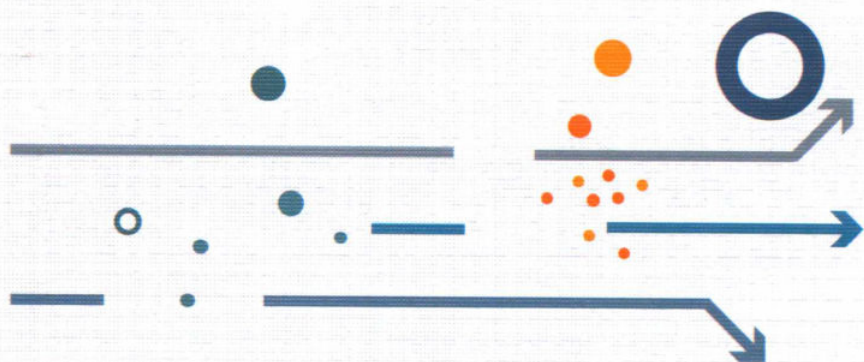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 Archiv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中外公共档案馆 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

● 谭必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 Archiv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中外公共档案馆 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

● 谭必勇 /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 / 谭必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 - 7 - 5203 - 4678 - 8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档案馆—档案管理—对比研究—
中国、外国 IV. ①G2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63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谭必勇新近写成《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一书，索序于我，我本来是不打算应承的，因为作序这件事，是需要资望的，而我博士毕业留校后虽教授档案学近25年，但毕竟学的是图书情报，于档案学算半路出家，兼之兴趣广泛，实缺少深入研究，现在又来到图书馆做馆长，离档案学越来越远，所以，对于必勇的这本档案学新著，我实无资格一序。不过，必勇是我带的首届博士，且在攻博之前，已从我攻硕，其本科也在武大信管院，本科毕业论文也是选我做的导师。他和我在珞珈山，有十年师生情谊。从这一点上，我是无法拒绝的。他博士毕业后任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我还特别赠了他一首诗：

忆共东湖畔，十回芳草萋。尘间人忽北，天上火犹西。

循道谁开悟？从今自觉迷。男儿志高远，昂首泰山低。

必勇是我的学生当中极为内秀和勤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特别专注于专业。这一点与我完全不一样。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时常来找我，每来，通常会准备一些问题，有时也会带上习作，这样，我们就能时常交流。武大信管院的档案专业学生，基本上是一批非档案专业人士在培养，因为从事档案教学的教师，多数无档案专业背景。这虽然是一个不足，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时也是一个优点。比如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而我通常较懒，不太动笔写文章，但必勇会在与我聊天的过程中，或是直接问询，或是敏感地发现研究的领域及切入点，尤其是在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之间寻找结合点，我们也合作写了不少论文，有些公开

发表了,有些则被我压着,觉得还有待深入,而我又不能专注于修改,所以后来也就往往束之高阁。

必勇不善言谈,在现实中有些木讷,但在专业论坛上却是活跃分子。《档案管理》的蔡千树先生特别具有号召力,也特别有眼光。他招致了一批热心于档案学的人将档案理论论坛办得热火朝天。可以说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档案管理》是档案学领域不在核心的核心,档案理论论坛是最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坛。而必勇就是他招聘的版主。并且鉴于必勇的能力,还特别将《外国档案》电子期刊交由他办理。大概也受益于主编《外国档案》,也由于一年多的出国访学,所以他积累了一定的外文资料,从而帮助他形成对比的视角,并从中找出我国公共档案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的这本新著可以说观点明确,引证丰富,特色鲜明。我不想在这里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更多的评价,倒是特别想说说“修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为学,就是学习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己,就是不断地美其身,使自身完善。为人,则更多地是为了炫耀,或者为了谋生。在今天,很多人为了谋生而炮制论文、著作。这个社会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人们阅读、写作不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而只是简单地为了改善生活。所以如何在谋生的同时养好心,修好身,是非常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拿这话来与必勇共勉。

是为序。

王新才

2018年12月25日于珞珈山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源起	(2)
第二节 研究述评	(5)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42)
第一章 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源流与演变	(45)
第一节 西方早期档案馆开放思想的萌芽	(46)
第二节 近现代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58)
第三节 当代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深化与传播	(85)
第二章 中外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	(108)
第一节 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外动力	(109)
第二节 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内动力	(128)
第三节 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竞合性动力	(136)
第三章 国外公共档案馆的主要发展模式	(142)
第一节 统筹发展模式	(143)
第二节 自主发展模式	(151)
第三节 转型发展模式	(174)
第四章 当前国外公共档案馆的基本运行机制	(193)
第一节 档案资源整合的平衡机制	(194)

第二节 公共服务的复合供给机制	(203)
第三节 经费筹措的多元保障机制	(211)
第四节 决策治理的制衡机制	(222)
第五章 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推进策略	(229)
第一节 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社会环境	(230)
第二节 公共档案馆建设探索的经验与困境	(242)
第三节 中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基本策略	(249)
结 语	(262)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85)

导 论

公共档案馆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概念,开放、亲民、平等是其核心特征,当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公共档案馆均被国家明确列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等机构一样,是公众文化休闲的重要场所。1960年3月,中国国家档案局颁发《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规定县、省档案馆均为“文化事业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在创建之初就明确了公共档案馆的建设方向,而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档案馆具有一定公共档案馆的特征^①。不过,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各地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实践依然局限于以开发档案教育价值为重点的拓展服务,未能上升到公共档案馆的整体范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档案馆”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并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化机构共同被国家列入公共文化设施的范畴,由此开始进入国家公共文化事业顶层设计的视野^②。最先对此作出回应

① 郭红解:《论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8期。

② 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显示,1983年我国政府首次将档案馆与图书馆、科技馆等并列纳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划当中。不过直到199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才再次提出“加强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设施建设”,而1997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重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档案馆列入公共文化设施范畴。此后,虽然公共文化设施的提法多有变法,如“公益性文化事业(1998年)”“文化设施(2001年)”“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2002年)”等,但档案馆均位列其中,体现出“档案馆”已经常态化进入国家文化事业的顶层设计体系当中。具体参见中国政府网整理发布的《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年)》,网址为:http://www.gov.cn/guoqing/2006-02/16/content_2616810.htm。

的是地方档案行政管理机构。2002年4月,深圳市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①,首次在地方法规中提出“公共档案馆”概念和建设“公共档案馆”的要求与举措。与此同时,档案馆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热点。《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新探》(2001年)^②、《档案馆论》(2002年)、《档案馆学新探》(2003年)^③等专著先后出版,薛匡勇的《档案馆论》一书首次就构建国家公共档案馆系统进行了理论阐释^④。2003—2006年,上海、北京、沈阳、西安、天津等地多次举行公共档案馆建设专题研讨会,推动了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由此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开始从法理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向兼具法理意义与实质功能的公共档案馆的快速转型。尽管近年来我国各地公共档案馆建设取得了不俗成绩,一些颇具特色的公共档案服务项目和管理模式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兴趣,公共档案馆的社会形象逐步改善,但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仅40多年的时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实践历程还很短,为此系统地梳理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源流、解析中外公共档案馆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掌握当前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的制度特征与规律,对于深化中国公共档案馆理论研究、提升中国未来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水准、提高公共档案馆系统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及价值,均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源起

公共档案馆的产生与发展,是近现代档案馆进入高级阶段的表征,也是档案馆由封闭、半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必然产物。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欧洲档案机构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至4世纪古希腊文明时期的密特伦神庙(Metroon),该神庙位于希腊雅典的公共广场之上,收藏着各种条

① 《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中国档案》2002年第8期。

② 姜之茂:《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新探》,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③ 何振:《档案馆学新探》,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④ 薛匡勇:《档案馆论》,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91页。

约、法律、公民大会的记录及其他公共文件^①。此后的数个世纪，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均建立了相对规范、合理的文档保管体系和一定数量的档案收藏机构，不过这些制度与机构遗产都随着两个帝国的衰落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使得欧洲各国在公元 1000 年之前形成的文件几乎全部被损毁，从而未能对近现代西方档案管理体系产生直接影响^②。中国古代拥有悠久的档案管理传统与制度，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档案实体保管制度与统治级别和等级秩序相关，尤其是那些与皇权相关的或与国家统治命脉直接相关的文书档案受到最为严密的控制，不过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的传统在于强调编纂整理、内容诠释及思想传播，这与强调分类整理的中国近代档案工作重心难以契合^③，因此它事实上难以直接孕育中国的近现代档案管理机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认为，“如果不控制档案，就无法控制记忆、获得政治权力”^④，因此在古代，无论是欧洲各国还是中国，官方档案机构基本是统治者的附庸，其服务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当时的教会档案馆、法院档案馆、城市档案馆、家族档案馆等非国家档案馆由于所收藏的档案只限于宗教团体、家族和机构档案，因而不具备对外服务的功能，只有少数享受特权的研究者出于公务目的才可查阅^⑤。18 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是西方近代档案工作发展的分水岭，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档案馆——巴黎法国国家档案馆在 1790 年正式诞生，四年之后（1794 年 6 月 25 日）法国又颁布了著名的《穠月七日档案法令》，明确宣布公民有权利利用档案馆的公共文件^⑥，在全世界首次从法制上为档案馆

① [美] T. R. 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 页。

②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55, No. 1, Jan. 1992, pp. 14–15.

③ 梁继红：《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学术传统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4 月 18 日第 B04 版。

④ 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4.

⑤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55, No. 1, Jan. 1992, p. 17.

⑥ Ernst Posner, *Archives & The Public Interest*,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7, pp. 25–26.

向普通公众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被誉为档案领域的“人权宣言”^①。至此,档案馆终于打开了面向普通公众的这扇大门,掀开了世界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序幕^②。

经过两百多年的艰难探索,西方各国基本建立了成熟的公共档案馆服务体系和制度规范,在服务政府与社会公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引起了中国档案界的关注。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伴随着历史档案大规模整理实践的开展和民众档案意识的萌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向欧美学习,蒋廷黻、傅振伦、王重民、姚从吾等均亲自参观过欧美档案馆建筑及馆藏,朱士嘉则专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学习档案管理法”,部分西方档案学著作被译介至国内,这些见闻使得我国档案界意识到“欧美档案开放与国内长期的档案禁秘形成强烈反差”^③,国内的档案开放意识开始萌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以中华图书馆协会、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为代表性的学术与行政机构的推动下,《呈请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案》(1929年1月)、《重设国史馆案》(1934年1月)、《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案》(1939年1月)等议案被先后提出,从立法、制度设计上推动中国国家档案馆的建立,试图跟上世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时代潮流^④,可惜最终未能完成创建国家档案馆的宏大目标^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很快就创建了国家档案局(1954年),并逐步组建了由国家到地方的国家综合档案馆运行系统。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这是中国档案馆由封闭走

① 早在1766年,北欧的瑞典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Act*),是推动档案开放的实际先驱,但论及对整个欧洲社会以及世界档案学发展的影响,则远远不及《稿月七日档案法令》。具体参见Java Valge, Brigit Kibal,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Archives and Records in Europe: A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Vol. 28, No. 2, Oct. 2007, p. 196。

② 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4期。

③ 覃兆判:《我国档案工作早期学欧美及其意义》,《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④ 据不完全统计,1912—1949年,全球有近30个国家新建或重组了国家级档案馆,苏联、波兰、西班牙、美国、苏丹等国建立了全国性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丹麦、瑞士、挪威、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国家级档案工作者协会也先后成立于这一时期。参见牛创平等编著《世界档案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04页。

⑤ 谭必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筹建“国家档案馆运动”的回顾与展望》,《档案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向开放的标志性事件^①。此后,以档案的开放与利用、档案馆服务等为主题的学术研究逐步升温,“公共档案馆”一词也时常出现在介绍西方档案事业的文章之中^②,不过将“公共档案馆”上升为理念层面深入研究则是2002年之后的事。

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化,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开始主动转变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乡村档案馆、社区档案馆、流动档案馆等新兴档案馆形态。当前新政策环境、新技术的运用和社会力量的加入导致我国档案公共服务领域中责任链与需求链的模糊与差异,原有的公共档案馆格局面临变革。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公共档案馆服务体系与推广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政策议题。

第二节 研究述评

早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公民获取利用公共文件(档案)的权利得到了立法的承认,但在档案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公民利用档案依然受到诸多限制^③,这一状况实际与国际政治环境有很大关联。长期以来,近代意义的“公民政治”的内容基本局限于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利与义务方面较少,直到“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才更加突出了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利的保护^④。与此同时,经过17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家族档案、社团档案等私有档案管理领域的实践,档案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公共利用”潜能逐步为人们所认知,并引起了公共部门的重视,到20世纪50年代转为国

① 宗培岭:《公共档案馆你从哪里来——写在上海市档案馆新馆开馆之际》,《浙江档案》2004年第1期。

②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之一即1838年成立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2003年该馆与皇家手稿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anuscripts)合并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加拿大公共档案馆(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成立于1912年,直到1987年改名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因此国内学术界在介绍英国和加拿大档案事业时,经常会使用“公共档案馆”一词。

③ 王改娇:《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51页。

④ 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际社会的普遍共识^①。受此影响,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问题逐步成为国际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

一 国外公共档案馆研究综述

自18世纪末期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以来,公共档案馆理论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然而直到“二战”后公共档案馆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推广,相关理论研究才走向深入。西方英语世界的早期档案学专著,如荷兰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1898年)和英国的《档案行政管理手册》(1922年初版,1937年再版),关注的是档案的形成、整理与保管问题,对档案利用涉及不多,更未论及公共档案馆。1956年,美国“现代档案之父”西奥多·罗斯福·谢伦伯格(Theodore Roosevelt Schellenberg)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正式问世,该书虽以首倡档案“双重价值鉴定”理论著称,但开篇却对法国、英国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成立过程及其主导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②,是研究西方公共档案馆成因的重要文献。综合近几十年来国外公共档案馆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档案馆思想与发展史研究

欧美发达国家早期的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专任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人文学科背景,加拿大的特里·库克(Terry Cook)、美国的理查德·J.考克斯(Richard J. Cox)和玛格丽特·赫德斯特伦(Margaret Hedstrom)以及澳大利亚的休·迈克米希(Sue McKemmish)均是史学出身而成为当代著名档案学者。当20世纪中叶欧美档案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时,公共档案馆思想和发展史的研究也就自然兴起。

公共档案馆史研究与档案事业史的整体研究密不可分。美国档案教育的先驱、德裔美国档案学者恩斯特·波斯纳(Ernst Posner, 1892—1980年)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档案管理课程的创始人,也是较早开展档案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他于1964年和1972年先后出版了《美国州立

^① Eric Ketelaar, “Muniments and monuments: the dawn of archives as cultural patrimony”, *Archival Science*, Vol. 7, No. 4, Dec. 2007, pp. 343–357.

^② [美] T. R. 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8—15页。

档案馆》(*American State Archives*)^①和《古代世界的档案馆》(*Archives in the Ancient World*)^②两部专著,前者对美国州立档案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作了系统梳理,后者则对古代世界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的源流进行了探索。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将波斯纳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以“档案馆与公共利益”(Archives & Public Interest)^③为题结集出版,体现出他在公共档案馆发展史领域的贡献,他将欧洲档案传统介绍到北美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④。1965年,杜克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生豪斯顿·格温·琼斯(Houston Gwynne Jones)对1663—1903年北卡罗来纳州公共文件的保管与管理状况、档案管理机构的时代演变、主要档案工作者的思想与实践贡献等进行了历史梳理,完成了题为《北卡罗来纳州公共档案馆(1663—1903)》的博士学位论文^⑤。数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专著对1776年以来美国国家档案馆从设想变为现实并逐步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国家档案馆的组织结构、管理职能、服务理念等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⑥。匹兹堡大学的理查德·J.考克斯是较早研究档案史的美国学者,他的众多档案史研究论著里有不少涉及欧美公共档案馆发展史^⑦。亚历山大·盖尔芬德(Aleksandr Gelfand)总结了从伊凡雷帝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

① Ernst Posner, *American State Archive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② Ernst Posner, *Archive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Ernst Posner, *Archives & The Public Interest*,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7.

④ Angelika Menne-Haritz, "Ernst Posner's Archive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68, No. 2, Fall/Winter 2005, p. 329.

⑤ Houston Gwynne Jones, *The Public Archives of North Carolina, 1663 - 1903*, Ph. 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65.

⑥ Houston Gwynne Jones, *The Records of A Nation: Their Management, Preservation, and Use*, New York: Atheneum, 1969.

⑦ 代表性的论文和书籍有: Richard J. Cox, "American Archival History: Its Development,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6, No. 1, Winter 1983, pp. 31 - 41; Richard J. Cox, "Professionalism and Archiv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9, No. 3, Summer 1986, pp. 229 - 247; Richard J. Cox, *American Archival Analysi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etuchen, N. J.,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0.

斯档案馆体系的演变历程及基本经验^①。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公共档案馆史专题学术论文并不多见^②。此后受北美地区档案学教育兴起的影响,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开始增多。加拿大档案界较早系统地开展了相关研究,早在 1976 年著名档案学者休·A. 泰勒(Hugh A. Taylor)就在正式创刊不久的《档案》(*Archivaria*)杂志上撰文,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初步梳理^③。为了表彰曾任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四任馆长(1948—1968 年)和加拿大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53—1968 年)威廉·凯·兰姆(William Kaye Lamb)在档案管理和图书馆领域的杰出贡献,加拿大《档案》杂志在 1983 年推出了一本纪念专刊,其中三篇文章涉及公共档案馆史,对 1871 年以来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由时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档案馆馆长(1976—1986 年)、后出任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第七任馆长(1999—2004 年)和首任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2004—2009 年)的伊恩·E. 威尔逊(Ian E. Wilson)撰写的关于早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演变史的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书分部(Records Branch)与档案分部(Archives Branch)两种不同传统在构建公共档案馆体系中的角色^④。伊恩·E. 威尔逊深入研究了公共档案馆的内在发展规律,并考虑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形成了一

① Aleksandr Gelfand, “‘As Vast as the Sea’: An Overview of Archives and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Russia from the Time of Ivan the Terrible to World War I”,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79, No. 2, Sep. 2016, pp. 230–253.

② 代表性的论文有: Ralph Lounsbury, “Historical Résumé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the State of São Paulo, Brazil”,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5 No. 4, Oct. 1942, pp. 245–251; Peter Topping, “The Public Archives of Greece”,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15, No. 3, July 1952, pp. 249–257; Bernard Weilbrenner,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1871–1958”,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Vol. 2, No. 3, 1961, pp. 101–113; Ernst Posner, “Manual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Archives in France: A Review Article”,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35, No. 1, Jan. 1972, pp. 51–58.

③ Hugh A. Taylor, “Canadian Archives: Patterns from a federal perspective”, *Archivaria*, Vol. 1, No. 2, Summer 1976, pp. 3–19.

④ Ian E. Wilson, “‘A Noble Dream’: 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Archivaria*, No. 15, Winter 1982–1983, pp. 16–35; William George Ormsby,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1948–1968”, *Archivaria*, No. 15, Winter 1982–1983, pp. 36–46; Michael D. Swift, “The Canadian Archival Scene in the 1970s: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Archivaria*, No. 15, Winter 1982–1983, pp. 47–57.

种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范式。1983年,理查德·C.伯纳(Richard C. Berner)分析了两个多世纪美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后认为,美国档案管理存在两个传统:一是源自私人收藏机构和国会图书馆的历史手稿(Historical Manuscripts)管理传统,二是受德国、法国影响而成的公共档案(Public Archives)管理传统^①。美国学者卢克·J.吉利兰-史怀兰德(Luke J. Gilliland-Swetland)^②和丽贝卡·赫希(Rebecca Hirsch)^③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手稿”与“公共档案”两种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对美国当代档案职业发展的现实意义。1986年,英国历史学者菲利普·莱文(Philippa Levine)对1838年至1886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重点对英国公共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发展进行了分析^④。1991年,约翰·D.坎特韦尔(John D. Cantwell)则进一步对1838—1958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总结^⑤。

公共档案馆的创建、发展与杰出档案学家的贡献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公共档案馆的推动者、创建者和重要贡献者的思想,也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从现有资料看,公共档案馆思想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一是对个体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梳理与分析。欧美各国公共档案馆或国家档案馆的推动者、创始人成为研究的重点。1973年,伊恩·E.威尔逊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重点探讨了加拿大第二任公共档案馆馆长阿瑟·G.道蒂(Arthur G. Doughty)的思想以及其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贡献^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重要推动者、“美国档案职业之父”沃尔多·吉福德·利兰(Waldo Gifford Leland)的思想则成为

① Richard C. Berner,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alysi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② Luke J. Gilliland-Swetland, "The Provenance of a Profession: The permanence of the Public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nuscripts Traditions in American Archival Histo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54, No. 2, Spring 1991, pp. 160-175.

③ Rebecca Hirsch, "The Permanence of Provenance: The 'Two Traditions' and the American Archival Profession", *Journal of Archival Organization*, Vol. 8, No. 1, June 2010, pp. 54-72.

④ Philippa Levine,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Its Staff, 1838-1886",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1, No. 398, Jan. 1986, pp. 20-41.

⑤ John D. Cantwell,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1838-1958*, London: HMSO, 1991.

⑥ Ian E. Wilson, *Shortt and Doughty: The Cultural Role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1904-1935*, Ontario: Queen's University, 1973.

美国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①。二是对群体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提炼与梳理。最具代表性的是历经加拿大数代公共档案馆馆长和业务精英的提炼而形成的适合加拿大档案文化与发展的“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s)思想。1972年,这一思想经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五任馆长(1970—1984年)威尔弗雷德·I. 史密斯(Wilfred I. Smith)正式提出之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视为加拿大档案界对国际档案界的重大理论贡献。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②对此有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加拿大独立学者劳拉·米勒(Laura Millar)则系统地研究了“总体档案”的思想来源、演变过程及面临的挑战^③。

2000年前后,国际公共档案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档案馆演变史研究开始得到欧美主流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档案界重新进入国际档案界^④,时任荷兰国家档案馆馆长的埃里克·卡特拉(Eric Ketelaar)和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文件处置部主任的特里·库克等著名学者先后在1992年和1994年访问南非,一方面将欧美的公共档案馆理念引入南非,另一方面又积极将南非的档案实践介绍给西方世界,由此加快了南非公共档案馆的建设进程^⑤。南非著名学者、南非曼德拉基金会档案保管部主任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对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后的南非公共

① Rodney A. Ross, "Waldo Gifford Leland: Archivist by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6, No. 3, Summer 1983, pp. 264 - 276.

② Terry Cook, "The Tyranny of the Medium: A Comment on 'Total Archives'", *Archivaria*, No. 9, Winter 1979 - 80, pp. 141 - 149.

③ Laura Millar, *The end of total archives?: An analysis of changing acquisition practices in Canadian archival repositor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Laura Millar, "Discharging our debt: 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 *Archivaria*, No. 46, Fall 1998, pp. 103 - 146; Laura Millar, "The Spirit of Total Archives: Seeking a Sustainable Archival System", *Archivaria*, No. 47, Spring 1999, pp. 46 - 65.

④ 1991年南非国家档案馆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而实际上早在1928年的南非联邦时期(Union of South Africa),时任南非联邦公共档案馆副馆长的科林·格雷厄姆·博塔(Colin Graham Botha)就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南非早期公共档案馆发展史的小册子,引起了当时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具体参见 Colin Graham Botha, *The Public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 1652 - 1910*, Cape-town: Cape Times, Ltd., 1928。

⑤ Verne Harris, "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 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1990 - 1996", *Archivaria*, No. 42, 1996, pp. 7 - 20.